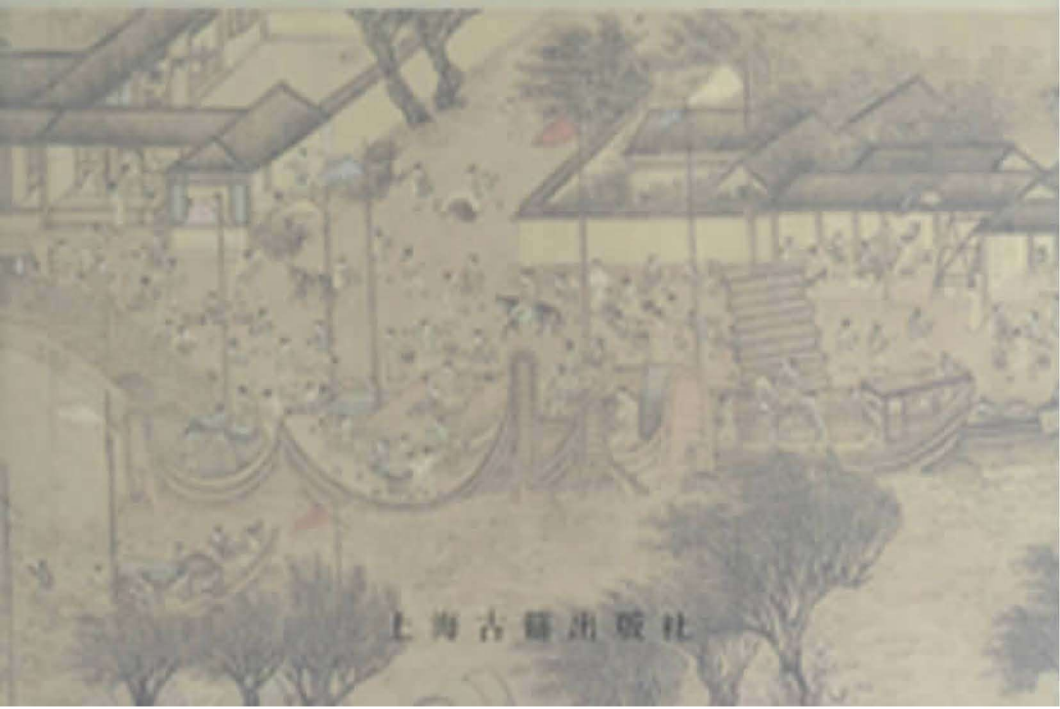


沈周集

（全二册）

（明）沈周 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沈周集 / (明)沈周著; 張修齡, 韓星嬰點校. —
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3.6
(蘇州文獻叢書第二輯)
ISBN 978-7-5325-6860-4

I. ①沈… II. ①沈… ②張… ③韓… III. ①中國文學—古典文學—作品綜合集—明代 IV. ①I214.8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119765 號

蘇州文獻叢書第二輯

沈周集

(全二冊)

[明]沈周著

張修齡 韓星嬰 點校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張 36.25 插頁 9 字數 964,000

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2,300

ISBN 978-7-5325-6860-4

I · 2678 定價: 11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總 序

王衛平 羅時進

吳之地域，自遠古形成，至今已有數千乃至萬年歷史。這一歷史的浩瀚川流，混茫遠接，涵演淵深，太湖文化於茲含孕；這片天賜的豐沃皋壤，盡望無際，滿目森茂，江南文明緣此成長；而憑陵高峻，俯瞰川原之古往今來，所映現的又不止是吳地之文化與文明，而是中華民族發展史，人類社會進步史的縮影。

初民遠逝，先賢杳渺。我們無法真正站在歷史的源頭，透過世代的時序去說明什麼，也無法站在其中任一驛站，撫摩當時的現場去顯示什麼。但憑借前人留給我們的豐富遺產，對吳地的歷史事件、過程、走向、結果都可以做某種程度的考證，做力所能及的還原，而視今探古，唯物以求，也能進行一定意義上的總結。吳文化，正是人們對吳地古往今來一切物質和精神現象的概括、提煉、呈現。她是吳地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的“人文化成”，即“文”作為一種存在意識和方式“化”入生產、生活、生命而形成的物質和精神的發展成果。

考察吳地“人文化成”的過程，當着眼於地、人、文三者的互動共生的關係。“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”，這在吳文化研究中是非常必要的。自然地理環境在吳地的歷史發展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，是人才與文化產生的土壤。正如陳去病云：“端委化俗文明開，延陵觀樂中原回。四科言氏尚文學，宗風肇起孳胚胎。加以

太湖三萬六千頃，澄泓渟蓄何雄恢。朝鍾夕毓孕靈秀，天然降茲追屈攀宋之奇才。”^①穆彰阿亦謂：“蓋聞文章之事關乎其人之學之養，而其所由極盛而不已者，則非盡其人之學之養爲之，而山川風氣爲之也。江南乃古名勝之區，其分野則上映乎斗牛，其疆域則旁接乎閩越，而又襟長江而帶大河，挺奇峰而出秀巘，故其靈異之氣往往鍾於人而發於文章。”^②正是清明靈秀的地理環境作用於人，方促進了“詩書之澤”、“文獻之邦”的形成，使得唐宋以來，尤其是明清時期，吳地出現了海內千百年從未產生，其他地域環境中也難以復現的人文盛景。這裏不妨看一看嘉靖年間陸師道在《袁永之文集序》中對明代吳中文苑巨匠騰躍景況的描述：

吳自季札、言游而降，代多文士。其在前古，南鏐東箭，地不絕產，家不乏珍，宗工巨人，蓋更僕不能悉數也。至於我朝受命，郡重扶馮，王化所先，英奇瑰傑之才，應運而出，尤特盛於天下。洪武初，高、楊四雋，領袖藝苑。永宣間，王、陳諸公，矩矱詞林。至於英孝之際，徐武功、吳文定、王文恪三公者出，任當鈞冶，主握文柄，天下操觚之士，向風景服，靡然而從之。時則有李太僕貞伯、沈處士啓南、祝通判希哲、楊儀制君謙、都少卿元敬、文待詔徵仲、唐解元伯虎、徐博士昌穀、蔡孔目九逵先後繼起，聲景比附，名實彰流，金玉相宣，黼黻並麗，吳下文獻於斯爲盛，彬彬乎不可尚已。正德、嘉靖以來，諸公稍稍凋謝，而後來之秀，則有黃貢士勉之、王太學履吉、陸給事浚明、皇甫僉事子安，皆刻意述作，力追先哲，而袁君永之，寔頡頏其間。^③

① 《陳去病詩文集》卷一《浩歌堂詩鈔》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9年。

② 潘世恩《潘氏科名草》，光緒三年吳縣潘氏燕翼堂刻本。

③ 《袁永之集》，明嘉靖二十六年姑蘇袁氏家刊本。

這是一份“文壇點將錄”，然而纔開到明嘉靖中期，已是繁不勝舉了，後來之英哲宗師復有多少？綜觀歷代，豈能盡數！這是值得吳中，即今天蘇州驕傲的成就。對於吳中這一人文盛況，我們應當從吳文化的層面上加以研究。

這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。吳文化具有歷史的屬性，也有現實的價值。廣袤的吳地，現代的發展與成就，與其過往悠悠的步履跡脈相連。今日萬物生命之根系，存在於歷史的土壤中；當下事物運動之動能，亦由歷史而累積。因此回望吳文化，不但可以建立一種文化自信，也能從傳統中為人們今天所從事的事業，尋求到借鑒與經驗。除此之外尚應看到，吳文化是地域文化，具有鮮明的地方性特點。這種地方性特點，正包含了豐富的地方經驗，它不但是方言音聲、風俗習慣、社會公序等形成的條件，也是在文化層面上與其他地域進行比較、映照的根據。從這一意義上說，研究吳文化，就不僅僅具有某種地方性意義了。它是對吳文化寶庫的建構，也是對民族文化寶庫的豐富。

吳文化研究，可以從不同路徑進行，而最基礎性的工作，當推文獻整理。1918年冬，吳江一批有識之士認識到地方文獻保護的重要，由柳亞子和薛鳳昌發起，成立了“吳江文獻保存會”（又稱“松陵文獻保存會”），其《吳江文獻保存會書目序》曰：

吾吳江地鍾具區之秀，大雅之才，前後相望，振藻揚芬，已非一日。下逮明清，人文尤富，周、袁、沈、葉、朱、徐、吳、潘，風雅相繼，著書滿家，紛紛乎蓋極一時之盛。且也一大家之出，同時必有多數知名之士追隨其間，相與賞奇析疑，更唱迭和；而隔世之後，其風流餘韻，又足使後來之彥聞風興起，沾其膏馥，而雅道於以弗替。用是詞人才子，名溢於縹囊，飛文染翰，卷盈乎緗帙，斯

故我鄉里之光也。^①

松陵一地之文獻尚且如此，蘇州一府文獻之富就更為洋洋可觀了。“文獻無徵，後生之責。夫責固有之，情更應爾。”因此，我們有必要對吳中文獻做有計劃的整理和研究，在現代學術理念指導下，建構與蘇州文化、經濟、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文獻庫，作為儲存吳文獻、發展吳文化的平臺。

兩年前，經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領導小組批准，我們蘇州大學建立了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。這是一個面向環太湖地區，面向江南，全面研究吳文化的科研機構。我們擬將吳文化之文獻作為研究重點之一，而蘇州是吳文化的核心地區，自然希望利用在地研究的條件，首先從蘇州文獻整理入手。蘇州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視地方文化建設，對地方文獻整理具有自覺的文化意識，非常支持這項工作，特別設立了專門項目，於是便有了這套蘇州文獻整理研究的系列。

文獻，是一個廣義的概念，古人以經史子集劃分四部，而每一部又有眾多類別。這些類別的著作在蘇州文獻中無不具備，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，我們難以窺其全豹，畢功一役，故叢書擬擇其精華而選，逐步整理面世。而在選擇中尤其注意有代表性，且到目前為止尚未見整理的著作。古籍整理是一項學術性很强的工作，我們希望盡可能遵循學術規範，精益求精，但一定會不同程度地存在問題，尚望各方面人士給予批評指正，使我們的整理工作不斷走向完善。

（作者王衛平為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主任、羅時進為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）

^① 張明觀、黃振業編《柳亞子集外詩文輯存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289頁。

前 言

沈周(1427—1509),字啟南,號石田,又號白石翁,江蘇長洲(今屬蘇州)人。明詩文家、書畫家。

沈周生长在一个詩書之家,其父祖均為隱士,雖不仕而以文雅稱。“家庭之間,自相酬唱,下及童僕,悉諳文墨。”(文震孟《姑蘇名賢小記》卷上《白石翁先生》)少從邑人陳孟賢游,得前輩經學指授。年十一即能作百韻詩,上巡撫侍郎崔恭。嘗以賢良薦,筮得《遯》之九五,遂耕讀於相城里。所居曰有竹莊,一時名人,皆與交游,搢紳大夫,及後學好事者,常造其廬而請益于周。沈周為人和易寬厚,享譽遠近,而一直以“野人”自居,終不預政事。

沈周的學識精深廣博,“書過目即能默識,凡經傳子史百家,山經地志,醫方卜筮,稗官傳奇,下至浮屠老子,亦皆涉其要。”(王鏊《震澤集》卷二十九《石田先生墓誌銘》)長期的鄉野生活,加以學問的累積,使其對於文學藝術,感受獨特,且能觸類旁通,成就卓著。“文摹左氏,詩擬白居易、蘇軾,字仿黃庭堅,並為世所愛重。尤工於畫,評者謂為明世第一。”(《明史·沈周傳》)對於這樣一位優異的藝文大家,隱逸文人的傑出代表,我們有必要展現沈周的全貌,完整解讀其文學作品,特別需要認識其面廣量大的詩歌實績,瞭解其作品所折射的明代中葉社會生活和文化藝術的現實狀況,為學術界的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一個完備的範本。

有明以來,沈周與唐寅、文徵明、仇英一直被目為畫壇“明四

家”，論者評價沈周，一般就其繪畫藝術而言說，正如明“前七子”之一的邊貢云：“平生不識石田子，往往相逢畫圖裏。”（《華泉集》卷二《題石田畫二首為楊仲深作》）明人給予沈周之畫從來不吝讚譽之詞，王穉登《丹青志》云：“沈周繪事當代第一，山水人物、花卉禽魚，悉入神品。其畫自唐、宋名流，及勝國諸賢，上下千載，縱橫百輩，兼總條貫，莫不攬其精微。每營一障，則長林巨壑，小市寒墟，高明委曲，風趣冷然，使夫鑒者若雲霧生於屋中，山川集於几上，下視衆作，真培塿耳。山輿入郭，多主慶雲庵，及北寺水閣，掩扉掃榻，揮染不倦。公卿大夫，下逮緇徒賤隸，酬給無間。一時名士，如唐寅、文壁之流，咸出龍門，往往致於風雲之表。信乎國朝畫苑不知誰當並驅也！”圍繞沈周的繪事淵源、風格特色、師承變化，文徵明、王世貞、郁逢慶、張丑等在其文集專著中高度肯定了其畫作的藝術價值。朱謀壘視之為明代“三絕”之一：“評者謂石田畫，獻吉（李夢陽）詩，希哲（祝允明）書，為我朝三絕云。”（《續書史會要》）清人主流觀點也以為“周以畫名一代，詩非其所留意”。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七〇《別集類》二三《石田詩選提要》）不過明清兩代詩畫評論家，還是注意到了沈周的詩歌業績。李東陽以聲與形出於自然之兩途着眼，指出“有詩歌以為聲，藻繪以為形者”，而“說者謂詩為有聲之畫，畫為無聲之詩”，詩畫雖有相通處，相較而言，“詩之為聲，尤其重且難者也”。東陽認為沈周“多以畫掩其詩”，殊為可惜，因而有必要“梓行而人誦”，使沈集面世而得以窺其詩畫之全貌。（《懷麓堂集》卷七十四《書沈石田詩稿後》）吳中詩家楊循吉別具隻眼，反而認定沈周為“文章大家，其山水樹石，特其餘事耳”。此說深得錢謙益首肯：“同時諸老如李文正（東陽）、吳文定（寬）輩，俱惜先生以畫掩其詩，獨君謙斷以為文章大家。”（《石田先生詩鈔》附錄）朱彝尊《明詩綜》亦將沈詩選入，贊其能於“平衍中露新警語”，“變而成方”。（《明詩綜》卷三十）明清詩學大家的褒揚之語，大都

出於對沈周詩的總體把握，其中不乏對畫家之詩的特殊觀照，而對沈周詩的全面解讀，還必須建立在完整的文本基礎上。我們整理校點沈周的詩文別集，旨在藉此深入研究沈周文學作品的思想內涵和藝術風範，進而確立沈周的文學史地位。

整理校點《沈周集》，本身就是研讀沈周詩文作品的過程。錄寫、比照、編排、校對沈周詩文，不僅完成的是校勘古籍的程序，更是閱讀、考辨、求證、探究文本的學術經歷。通過反復細緻地校讀不同版本的沈周詩文集，我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了一位吳中才俊，一位有着鮮明個性的明代詩人。

首先，沈周是個布衣，熟悉耕讀生涯，長期與農夫、平民為伴，鄉村生活的泥土氣息和底層百姓的喜怒哀樂，都給他的詩歌打上了深刻的印痕。詩人唱出的就是普通農民的心聲：“犁鋤假筋力，竭勞供有身。身在勞何息，顧莫養精神。”“但餘秫一斛，酒熟歡已盈。醉引耕田歌，不復忌高聲。”（《田家詠》）真實而不矯情。其《堤決行》、《低田婦》、《割稻》、《霜降後一日書事》、《憫禾》、《水鄉孥子十首》等詩，已是直訴民瘼，道出了號稱富庶之地田間勞作的艱辛，特別是蘇地遭遇水澇災害後生民的痛楚。難能可貴的是，沈詩將鋒芒指向了社會的不公，其兩首同題的《桃源圖》，表達了減輕農民租役、安居樂業的良好願望：“啼饑兒女正連村，況有催租吏打門。一夜老夫眠不得，起來尋紙畫桃源。”“今人莫羨桃源好，一有桃源世無道。但願四海輕徭民不煩，春風處處是桃源。”布衣詩人沈周的詩作洋溢着強烈的現實精神和人道光輝。

沈周又是一名隱士，“棲心邱壑，名利兩忘。風月往還，煙雲供養，其胸次本無塵累。”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七〇《別集類》二三《石田詩選提要》）沈周長居“有竹莊”，元末明初楊維禎曾云：“余謂山林之士，托草木之芳以隱者多矣：或以菊，或以蒲，或以瓜，或以松，或以竹、以梅、以橘、以李、以槐者，不一足也。”（《東維子集》卷

十七《桂隱記》》沈周正可謂托“竹”以隱的山林之士，而其詩也是用來展現山林之士特性的明證。從沈集可以看出，在生活作派上，沈周酷愛自然，優遊林下，流連詩酒，廣結好友。詩人熱衷於遊山玩水，虎丘、天平、穹窿山，尚湖、太湖、揚子江，都留下了蹤跡。沈周曾因賞花近郊，“六年兩度來僧家”（《遊海雲觀連理山茶》）；為遊覽南京，“廿年重踏舊京塵”（《丹陽道中》）；又常常忙於觥籌交錯、迎來送往，在友人別墅，“分付清觴緩緩巡”（《立夏日山中遍遊後夜宿劉邦彥竹東別墅》），留賓客造訪，“題詩勸客休辭醉”（《顧應和新舟成過余楊湖……即席賦此》）。在哲學思想上，沈周接近老莊，追尚逍遙世外，尋求自在人生。詩人嚮往的是“歸來衡宇江之東，老去閒情賦榮木”，“悠優乘化樂天命，得反自然無不足”（《淵明小像》）的理想境界，而《東林小隱為沈廷佐作》一詩，幾乎就是其自畫像：“野老於今席不爭，林居草處任浮生。失時笑見山花落，得意閒聽春鳥鳴。已藉酒遺身外事，尚嫌詩掛世間名。有時深雪門還掩，折竹蕭蕭自曲肱。”甚而還高唱：“因之語群彥，為樂當及時。”（《客中辭錢允吉招酌》）當然這種安天樂命觀念的表達，又不時交織着人生無常、老境淒涼的感嘆：“明朝只恐都零落，為轉長坐托紙船”（《賞牡丹席上作折枝贈劉德成》），“有生但恐違溫飽，凡事無能與短長”（《窗下獨坐》）。這些詩句正是隨遇而安心緒的別樣披示。在為人處世上，沈周講究志節，鄙視污濁現實，力行獨善其身。在其詩文集中，有着大量的頌揚孝義，推崇節婦烈婦之作。“忽見丹青開慘澹，尚憐忠毅鬱崢嶸。”（《謁退庵陳僉憲祠堂》）每至忠臣義士之陵墓祠堂，沈周必留詩以表敬意，《謁岳墳》、《復劉龍洲墓》、《崖山大忠祠》、《謁夏忠靖周文襄新祠》等，即屬此類。特別是褒揚貞節女子的詩篇，如《烈女死篇》、《烈女生篇》、《葉婦高節詩》、《崔孝婦》、《顏烈婦俞氏義事》等，屢屢見於集中。錢謙益於沈有“沉浸理學，典而近腐”（《石田詩鈔序》）的評價，或就指這些詩中主人公

雖忠貞卻非愚即迂。其實，沈周並不是一個僵化守舊的刻板讀書人，李東陽曾指出“山林之文，尚志節，遠聲利”（《倪文僖集序》），祝允明更明示沈周“巢許其屈服而禹稷其腎腸”，並進而稱說：“若闕其詩，非孝忠節義也無觸於膺，無寄於聲，油油乎茁元化之嘉種，粒烝民於終古，其不類杜少陵與？”（《懷星堂集》卷二十八《石田記》）另外，不與惡俗勢力同流合污，堅持個人道德修養，也是沈周這位正直隱者的為人追求，“時修靜觀心齋裏，應物虛明頗涉靈”（《七十喜言五首》），“幽芳不揚抱隱德，僻地蕭條宜養賢”（《墻下野菊》）。靜志澄懷，無有外慕，沈周常以這些詩句昭示自己的隱德。

作為畫家的沈周，總是對山水景物顯得十分敏感，這固然出於熱愛大自然的情懷，用沈周的自道語來說，即“山水之勝得之目、寓諸心，而形於筆墨之間者，無非興而已矣”（汪珂玉《珊瑚網》卷三十八“石田自題畫卷”）。詩與畫的形成，都是情之所至的產物，沈周亦稱其畫作往往“乘興”而為，“不暇求其精焉”（同上）。自蘇軾評論王維“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”後，許多批評家都在詩與畫這兩個藝術品類上，探索其共性。的確，詩、畫都以訴諸形象為基本表現手段，特別都融入了創作者的心意和情感。沈周詩畫作品共同的不足，在於信筆而就，稍顯率意，而佳處恰在發自真情，妙得天趣。文徵明論其“大幅”“天真爛發”，然不免“粗株大葉，草草而成”（《甫田集》卷二十一《題沈石田臨王叔明小景》）。何良俊稱沈周之畫“元氣淋漓”，“昔人謂王維之筆，天機所到，非畫工所能及，余謂石田亦然。”（《四友齋叢說》卷二十八）若移之以論沈詩，亦為確評。沈周的詩筆，無論是摹寫山水勝景，還是花鳥魚蟲，都能契合天機，生趣盎然。似是信筆塗抹，卻用詩留下了姿態各異的鮮活畫面：“絕壁雲扶將墮石，豁崖風勒下奔泉。”（《拂水岩》）“偃松依舊存孤蓋，新竹公然過一頭。”（《雨後》）“新水一陂他自暖，跳魚何故却先知。”（《初春》）“楓葉點秋屋，蘆花白夜門。”“鷗趁撐舟尾，蟹行穿壁根。”

(《漁村》)他如《閒居四時吟》、《登吳汝秀萬竹亭》、《杏花》、《東野》、《支硎山麓逢楊君謙》、《遊張公洞》等詩，都在真切把握江南景觀特色的同時，融入了詩人與友朋的深摯神情。連眼界極高的錢謙益也謂其詩“才情風發，天真爛漫，抒寫性情，牢籠物態”(《石田詩鈔序》)。

沈周集中詩，常以其藝術家的視角，發現自然和社會生活中的佳景美物，凡亭台樓閣、古樹名木，瓜果菜蔬、簫杖團扇，均在刻寫之列。都穆《南濠詩話》稱沈周“以詩豪名海內，而其咏物尤妙”，不失為中的之論。此外大量以“題畫”為題的“題畫詩”，所題諸畫，有前朝名家、同代丹青高手之作，也不乏自作畫卷。王鏊對其畫作及自題詩論道：“間作繪事，峯巒煙雲波濤，花卉鳥獸蟲魚，莫不各極其態，或草草點綴而意已足成，輒自題其上，時稱二絕。”(《震澤集》卷二十九《石田先生墓誌銘》)文徵明也有這樣的評述：“所作多自題其上，頃刻數百言，莫不妙麗可誦。”(《甫田集》卷二十五《行狀二首·沈先生行狀》)要之，沈周題畫詩為明中葉詩壇增添了頗具影響力的藝術品類，為詩與畫的勾連、會通，起到了促進作用。

沈周是蘇州籍詩文家，其詩歌不僅具有濃郁的江南特性，也繼承了吳中詩歌的傳統風格。吳寬將沈周比之陸龜蒙，認為“吳之詩自魯望首倡，盛于宋，尤莫盛于元”，而沈周“自能接乎宋元之派，以上邇乎魯望”(《家藏集》卷四十三《石田稿序》)。吳中詩人，晚唐有陸龜蒙，南宋有范成大，元則有倪瓚、顧瑛，吳寬所言，大致即以此數子為代表。王禕在論及高啟時稱：“吳中之詩，唐有陸魯望，宋有范致能”，“在元惟子平(陳謙)”(《高季迪詩序》、《高青丘集·附錄》)。吳寬以為“其人多生于季世，其身雖隱，其時則窮，則其詩亦悲而已”，而吳地詩人因窮、因隱所生的悲情，往往使其詩風“清婉和平、高亢超絕者兼有之”(《家藏集》卷四十三《石田稿序》)。上述吳中詩人，或本為隱士，或因事告退，而詩風多與吳寬所言相似，如

顧嗣立論陳謙古賦及古今體詩，便以為“詭麗春容，詞辯鋒出不少讓”（《元詩選·三集》），正與“清婉和平”和“高亢超絕”接近。明開國文臣宋濂在談及“諸家之詩”“見於山林者”，“無非風雲月露之形，花木蟲魚之玩，山川原隰之勝而已，然其情也曲以暢，故其音也眇以幽”（《宋學士全集》卷六《汪右丞詩集序》）。方之沈周，其優遊林下及題寫畫卷之詩，顯然同於“眇以幽”者，也合乎“清婉和平”之風。至於“高亢超絕”的一面，在沈周集中，亦可見其端倪。沈詩不少作品並未完全置身世外，而是關注着家國大事，《九月十二日聞詔》、《聞邸報》、《讀楊宮詹與屠太宰論事劄子》，徑將朝廷大事寫入詩中。有些詩作以軍事將領為主人公、以兵家相爭為題材，充溢着昂揚的鬥志，摹狀着酷烈的場景：“直吞天派納海口，有若萬邦來會王。座中指點皆歷歷，蛟綃數丈萬里長。”（《為郭總兵題長江萬里圖》）“漆眸側睨奮脫鉤，控拳捩翅筋力遒。雉欲適飛膽先落，犀爪攫顛如就縛。”（《鵲打雉贈陶將軍》）“英魂尚附床頭劍，貫斗虹光直不斜。”（《程揮使翱殺賊海上疽背而卒》）“雲外旌旗婆勒渡，月中刁斗受降城。”（《從軍行》）在與友人聚散迎送時，詩人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激情：“記君同醉秦淮月，說劍談兵掉長臂”，“風寒老樹翻夜烏，天闊高雲舉秋鷺。”（《送友人還金陵》）“出門長嘯振林木，蒯緃短劍秋風涼”，“書生浩氣久憤激，要倚日觀攀扶桑。”（《送薛堯卿漫遊言登泰山謁孔林而迤邐求仙海上》）而好友辭世，同樣給詩人帶來刻骨銘心的悸動：“泌陽寄語真成夢，讀向秋風淚泫如。”（《挽劉大參欽謨》）“西序有攢俄殞雨，東林無樹不悲風。”（《挽沈東林》）還有的詩索性直接抒發懷抱：“顛倒千顛波，兀兀泛孤槎”，“浮遊天地間，何物能籠罩。”（《和王秋官元助寄陳育庵韻》）“沖風巨浪兼江動，變雨浮雲接地來”，“髣髴襟抱殊清爽，倚樹高吟且一回。”（《早起》）沈周自稱“心與陶翁有相得”（《閒居》），就其集觀之，卻也不乏陶淵明“金剛怒目”式的詩歌，表現出“浩蕩思惟表，其心共天遊”的

風範(《讀陶詩二首》)。沈詩具“高亢超絕”之風，當然緣於其嶄崎歷落的人格力量，歸根到底，正如全祖望所云：“先生非竟忘世者也。”(《鮚埼亭集外編》卷十九《石田先生畫像記》)吳中詩家自陸龜蒙以降，都承傳并發展着平淡與高邁的雙重傳統，明初高啟可以看作先於沈周的重要繼承人，也為沈周本人所認同：“吳中詩派自高太史季迪後，學者不能造詣，故多流於膚近生澀，殊失為詩之性情言句。”(《石田先生詩鈔》卷九《題周寅之詩稿》)王禕稱道：“季迪(高啟)之詩，雋逸而清麗。如秋空飛隼，盤空百折，招之不肯下；又如碧水芙蓉，不假雕飾，翛然塵外，有君子之風焉。”(《高季迪詩序》，《高青丘集·附錄》)從中不難看出高、沈一脈相承，都是吳中詩歌傳統的見證人。

沈周的詩學淵源，除了上述的陶淵明和吳中諸家外，值得一提的當數白居易、蘇軾、陸游等人，王鏊稱“其體裁初規白傅，忽變眉山，或兼放翁”(《震澤集》卷二十九《石田先生墓誌銘》)，文徵明也以為“其詩初學唐人，雅意白傅，既而師眉山為長句，已又為放翁近律，所擬莫不合作”。沈周本人亦有披露，曾說道“感茲白傅言，蹇予適相當”(《葺竹居》)，“余畫似倪迂，詩似陸放翁”(李日華《六硯齋二筆》卷二，“題贈吳瑞卿畫識語”)，且多有借用東坡韻所作詩。當然，像祝允明、錢謙益在沈周詩集的序言中，還提到了沈周有學杜甫、李賀的傾向。此外，沈周所致意者還有元末楊維禎，其《題楊鐵厓先生遺墨》讚楊氏“百剴不得折，突兀而輪囷。文章奇倔似生鐵，戛然有聲驚鬼神”。這些從唐至元的詩歌名家，幾乎都有被貶謫、受壓抑的經歷，終將懷才不遇的冤屈心情，消解於山水，融化成詩材，留下了後人仰慕的萬千佳作。明清文學大家的評論和沈周的自述，揭櫫了沈周詩歌和唐杜、白，宋蘇、陸及元楊維禎之間的思想、藝術關聯。從沈周集中，還能發現其詩一些突過前人之處，如《義商行》一詩，正面描述商人，以其義行為商人添上光彩的一筆；

從來妓女和下層藝人只是士大夫狎游的玩伴，沈周卻為之作了真心的褒揚和禮贊，《盒子會詞有序》、《白眉神詞有序》、《聞王優彈唱》、《悼妓溺死》、《贈妓》等便是明證。沈周的詩歌語言，有時不免有失雅正，“吐詞天拔而頽然自放，俚詞謾言亦時攔入”（陳田《明詩紀事》丁籤卷十一上）。沈氏詩語常通俗似大白話，如：“正月十六日惟良，九姑九姑我燒香。西家小女心最忙，喜聞開門占鳳凰。不似老夫無所問，惟知喫飯著衣裳。”（《結羊腸詞》）“打漁鼓，唱道情，說生說死說功名。唱道情，打漁鼓，說神說仙說今古。”（《送歲歌謝宗道士鼓板》）都像是民間說唱文學中的唱詞。更有不同尋常的是詩意發噓，多出詼諧戲謔之詞，所謂“從容發歌咏，時或間嘲謔”（《十一月廿三日入城會陳育庵》）。其《戲人短視》、《齒搖》、《食蘿蔔》、《理折齒》等，讀來直可令人噴飯。沈周的不少自嘲語，恰是身處窘境的辛酸狀的寫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沈周的詩情詩風，還與其身後興起的晚明文學思潮有着內在的相承聯繫，僅從袁宗道以“白蘇”名其詩文集，便可以看出其中的脈絡，因為白、蘇本是沈周和袁氏公安派的共主。

沈周的詩壇地位，還在於其周圍集聚着一大群吳中詩人，儼然成了吳中詩歌的代表人物，祝允明、唐寅、文徵明、楊循吉、徐有貞、周鼎、文林、史鑑、謝晉、杜瓊、陳蒙、朱存理、劉昌、劉溥等，與沈周相與往還，詩酒酬唱，結成了明中葉蘇州龐大的詩歌群體。這些吳中詩人或馳騁藝苑、清談世事；或甘於隱逸、逍遙自在。在明代復古運動即將大行其道之時，堅守着吳中文學多元發展的陣地。沈周本人和台閣重臣時有互動，王恕、王鏊、李東陽、吳寬等在朝詞臣與隱士沈周相得益彰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沈周以其卓越藝術才華促進了民心和輿情的上通下達。沈周集的可觀價值，也在於為後人提供了朝野詩文作家，特別是吳中文學家交往的線索，展示了江南詩家、畫家聚合的恢宏場景。

沈周的文學成就應包括古文和詞，主要見自崇禎本《石田先生詩鈔》，其文存有鄉人、友朋的傳記、墓誌，以及一些詩文集的序跋；詞則與寫景、題畫、咏物相關。另有《石田翁客座新聞》、《石田雜記》，記載沈氏聞見雜事，頗涉怪異，大致為前人所謂小說家言。

沈周詩文結集情況較雜，表現在成書時間、體例各有不同。我們整理、點校《沈周集》，主要依據下列版本：

《石田先生詩鈔》版心有“耕石齋石田詩鈔”字樣），崇禎十七年瞿式耜刻本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（齊魯書社影印本）。含《詩鈔》八卷，為錢謙益所選，卷一至卷四為古體詩，卷五至卷八為今體詩，所列作品依年編排，一年首出詩於詩題下注明年號與干支。《文鈔》一卷，為瞿式耜所輯。本集末附錢謙益輯《石田先生事略》一卷。

《石田稿》，稿本，不分卷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集部·別集類）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）。是集為沈周手稿，計一百八十四葉，所錄詩起正統十四年，至成化十九年止，而沈周晚年之作未予存錄。

《石田詩選》十卷，明正德刻本，弘治十七年間華琨選輯，安國重刻之。《四庫全書》即以此正德本為底本。不標體制，不譜年月，但分《天文》、《時令》、《山川》、《居室》等三十一類。

《石田先生集》，不分卷，萬曆四十三年陳仁錫刻本。按體分五言古一、五言古二、七言古、五言排律（附七言排律）、五言律一、五言律二、七言律一、七言律二、七言律三、五言絕（附六言絕）、七言絕十一個部分。亦有書目稱之為十一卷本。

《石田稿》，三卷本，明弘治十六年黃淮集義堂刻本。巡撫彭禮命黃淮梓行，知縣靳頤襄助其事。是集刻於沈周在世時，無分類，無編年。

本集雜著所據版本見下：

《石田翁客座新聞》十一卷，抄本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《子部·雜家類》。

《石田雜記》一卷，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活字本《學海類編》本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（齊魯書社影印本）。

《杜東原先生年譜》，見清顧文彬《過雲樓書畫記》卷四。題款有“門人長洲沈周編次”字樣。

為使研讀者能全面深入地瞭解沈周其人、其詩、其畫，我們收輯了大量得自史傳、方志、別集、總集、詩話、筆記及博物館藏品的相關資料，分列五個部份，以《沈周集附錄》附於集末。

現《沈周集》詩文部份，以上述五種別集為底本參校，《石田先生詩鈔》、《石田稿》（稿本），因大略有寫作年月線索，且《石田先生詩鈔》經過刪選、整理，《石田稿》（稿本）為作者親錄，二書作本集主幹，應該比較合理。《石田詩選》以類分，《石田先生集》以體分，讀者可從不同角度體認沈詩特色。《石田稿》（黃淮集義堂本）則難尋次序經緯，但仍可補前四種所錄篇目之不足。本集以五種別集上述次序排列，凡前一集已錄者，一般後一集不再出，但均以校語、注文說明之（凡未明示《石田稿黃淮本》者，則專指稿本《石田稿》）。沈周詩分見於各集，存在着同題不同詩、同詩不同題、題或詩大同而小異等情況，參校後亦以校語、注文析清。

點校、編定是集，雖已盡全力，但不免仍存誤缺，還請大方之家予以教正。